

尹绍亭 著

文化生态与 物质文化 论文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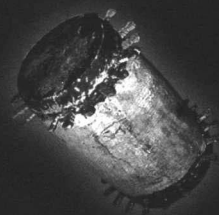
Cultural
Ecology
and
Material Culture (Thesis)

云南大学出版社
YUNNAN UNIVERSITY PRESS

G05/8

:2

2007



文化生态与物质文化

Cultural Ecology
and Material Culture (Thesis)

论文篇

尹绍亭 著

 云南大学出版社
YUNNAN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文化生态与物质文化. 论文篇/尹绍亭著. —昆明: 云南大学出版社, 2007

ISBN 978-7-81112-425-5

I. 文… II. 尹… III. 文化生态学—文集 IV. G0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7) 第142667号

尹绍亭
著
文化生态与物质文化 (论文篇)
Cultural Ecology and Material Culture (Thesis)



策划编辑: 邓立木

责任编辑: 纳文汇

装帧设计: 刘雨

出版发行: 云南大学出版社

印 装: 昆明市五华区教育委员会印刷厂

开 本: 1/16

印 张: 21

字 数: 282千

版 次: 2007年8月第1版

印 次: 2007年8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1112-425-5

定 价: 88.00元 (共二册)

社 址: 云南省昆明市翠湖北路2号云南大学英华园内

邮 编: 650091

电 话: 0871-5033244 5031071

网 址: <http://www.ynup.com>

E-mail: market@ynup.com

前言

石川荣吉、梅棹忠夫等编写的《文化人类学辞典》(弘文堂, 1994)“通过礼仪”条目说:“人的一生就像一根竹子, 有着诞生、成人、结婚、死亡等几个节。人出生后, 要通过一个个人生的节, 并要满足每个节应具备的条件, 从而获得新的使命和身份而不断成长。为此, 在一些社会中, 在通过人生关口的时候, 以保障其平安为目的, 需要举行一连串的仪式。”现代社会, 情况变了, 尽管人生的节仍然受到普遍的重视, 然而人们已不可能再沿袭传统神圣而烦琐的通过礼仪, 礼仪被淡化、异化、世俗化和多样化了。

我的学术生涯与生命过程一样, 经历过几个阶段, 也即“通过”了几个关节。今年我将告别云南大学人类学博物馆的工作岗位, 这无疑又是一个重要的人生之节。那么, 该做些什么, 以之纪念过去和面向未来呢? 20 多年前曾经调查大山里的拉祜族, 问到为什么要搞刀耕火种, 一位拉祜汉子脱口便说:“老黑(当地拉祜族的自称, 笔者注)没有田, 老黑没有地, 靠山吃山, 毁林开荒。”靠山吃山, 吃资源饭, 干嘛行靠哪行, 这是实实在在的道理。读书人就是读书人, 遇到关节, 想搞纪念, 除了舞文弄墨之外其他肯定难有作为, 于是便决定搜罗旧文, 以《文化生态与物质文化》之名编辑出版文集, 希望以此为自己举行一个有意义的“通过礼仪”。

几个月的时间, 收集文章, 认真阅读, 挑选出 20 篇论文, 涉及生态人类学、生态环境史、民族和文化地理、传统文化保护传承、物质文化等我所从事过的几个研究领域。另



有一篇《采访录》，为《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07年第3期“文化生态”特别栏目的特约稿件，那是较为详细地介绍我治学经历的文章。此文和论文组合在一起，几十年来走过的路便愈加清晰了。此外，除了论文，多年来还写过一些小文章，它们虽然写得随意，然而却是有感而发、有据而议、有物而论的文字，敝帚自珍，野草山花，搜集起来也是一道风景。而作为学术散文和田野报告，如果配以图片，效果自然更好。于是又从历年所拍的照片中选出约200帧插入文中，图文并茂，增加了可读性和可看性。这样一来，文集便成了两册：“论文篇”和“杂文篇”。

现在文集由云南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我的一次重要的“通过礼仪”算是圆满地降下了帷幕。今年5月收到《广西民族大学学报》之时，一时兴起，曾写诗一首，兹录于下，权当拙著的引子：

耳顺不妨偶登场，
雕虫未必笑大方。
风雨浴尽浮云淡，
铅华洗却是自然。
闹市忽悠喜剧短，
学海神游好戏长。
不信前程风光老，
会当绝顶举壶觞。

2007年夏日识于舒卷斋

目 录

前 言	
访谈录	1-16
人类生态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17-31
人类生态环境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	32-42
刀耕火种研究的背景、理论和方法	43-56
试论当代的刀耕火种 ——兼论人与自然的关系	57-71
民族文化的保护与发展	72-91
建设云南民族文化大省的设想	92-103
民族文化生态村建设 ——乡村文化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途径	104-119
云南民族文化生态村建设的理论与实践	120-128
试论云南民族地理	129-142
云南青铜文化地理初探	143-153
说“瘴”	154-163
云南在日本文化源流研究中的地位	164-183
亚洲稻作起源研究的回顾	184-196

目 录

197-213	云南农耕低湿地水稻起源考
214-237	云南山地民族农耕的产生和发展
238-263	中国犁的起源、形态和分布
264-276	云南的农业灌溉
277-286	傣族的木机榨糖技术
287-303	日本博物馆考察报告
304-313	云南大学人类学博物馆建设
314-326	社会学与方志学刍议
	后 记

Contents

Forwards	
Interviews	1-16
Anthropological Studies of Ecology: Past and Present	17-31
Anthropological Studies of Eco-environment History: Theories and Methodologies	32-42
The Study of Shifting Cultivation: History, Theories and Methodologies	43-56
Contemporary Slash and Burn	57-71
The Preserv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Ethnic Cultures	72-91
Reflections on Constructing Yunnan into a Great Cultural Province	92-103
Construction of Eco-ethnic villages: pathway to preservation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rural cultures	104-119
The Construction of Yunnan Eco-ethnic Villages: Theories and Practices	120-128
The Geography of Ethnic Minorities in Yunnan	129-142
The Geography of Bronze Culture in Yunnan	143-153
On Malaria	154-163
Yunnan in the Origin Studies of Japanese Culture	164-183
A Review of the Origin Studies of Rice Cultivation in Asia	184-196

Contents

197-213	On the Origin of Low Land Wet -rice cultivation in Yunnan
214-237	The Origin and Evolution of Agriculture among Hill Tribes in Yunnan
238-263	The Origin, Varieties and Distributions of Plough in China
264-276	Agricultural Irritation in Yunnan
277-286	Sugar -Making via Wooden Machinery among the Dai People
287-303	The Museum of Japan;a Report
304-313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Anthropological Museum of Yunnan University
314-326	Sociology and Gazetteerolgy
	After words

访谈录

陆 萍^①

被访者简介：

尹绍亭，男，1947年12月出生，云南大学人类学博物馆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云南民族博物馆副馆长、云南大学人类学系主任、云南大学人类学博物馆馆长、中国民族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影视人类学会副会长、日本国立民族学博物馆客座研究员、日本京都大学和东京外国语大学客座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生态人类学、人类学博物馆和文化遗产保护等。迄今有专著、译著十余种，论文近百篇。为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曾获云南大学伍达观教育基金优秀教师杰出奖。

访者：首先想请您谈谈您是怎样对人类学发生兴趣并走上人类学研究之路的。

尹：谈这个问题恐怕还得先从出身说起。我的家乡位于靠近缅甸的“蛮夷之地”，那里杂居着傣、景颇、阿昌、德昂、汉等民族，文化形形色色，风俗迥然各异。家乡叫孟连村，数十座土墙瓦房聚集在田园中一条清澈的小沟周围，一半是汉人，一半是傣族。汉人奉祖先规制，傣族行夷方传统，各行其是，和睦相处，可谓典型的“民族团结村”。从这样的地方走出来的人，自有所谓“族群”的情结和对文化差异的朦胧的感知。

^① 陆萍，女，壮族，1959年生，《今日民族》主编，云南省政协常委。



我家在当地被视做“大户人家”，除属于“黑五类”之一的地主之外，还有人在政府做官。伯父尹明德 1917 年留学日本，1929 年至 1947 年在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从事中缅界务的研究和外交工作。期间他曾数次受命率队深入受英军控制的中缅边境勘察边界，历尽艰辛，九死一生，获取了大量第一手资料，绘制了详细的地图，编写了《滇缅界务交涉史》《滇缅界务北段调查报告》《云南北界勘察记》（8 卷）、《滇缅南界勘察记》（6 卷）、《天南片羽》等调查报告，对中缅界务和我国的外交事业作出了很大的贡献。1942 年，日军侵犯滇西，伯父又受命于危难，代表重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奔赴边区，宣慰各民族土司及爱国人士开展抗日游击战争。此行历时三个月，于戎马倥偬之余写下《宣慰日记》（亦称《抗战日记》）二册。伯父留下的上述著作，主要价值在于外交和国防，然而也可供人类学研究参考。美国缅甸研究会主席、资深人类学教授 F.K. 莱曼（F. K. Lehman）即对伯父十分景仰和推崇，多次向我言及西方人类学者对伯父著作的重视。我国早期人类学家也都熟悉伯父著作，凡写民国时期滇西的民族，必参考引用。记得我少年时代在家乡读小学，放学回家无事便常常取出伯父的书来翻阅，对其记录的山川地理、人种风情充满好奇，颇为向往。后来几位热心的前辈劝我学习人类学，理由一是应以伯父为楷模，二是云南确为人类学研究的宝地。“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有机会读研究生了，于是报考了民族学专业，实现了自少年时代便萌发的夙愿。

访者：在您的学术生涯中对您产生过影响的学者都有哪些呢？

尹：由于家庭出身的问题，又逢“文化大革命”，青少年时代求学读书颇不顺利。“文化大革命”期间从学校分到工厂当工人，后考入云南机械研究设计院从事科技情报研究工作。1979 年，云南农业科学院院长程侃声先生欲翻译日本学者渡部忠世所著《稻の道》一书，找我协助其翻译。此书无论在理论还是在研究方法方面，都极富挑战性，是稻米起源研究领域的一本里程碑式的名著。作者在东南亚

和南亚从事田野调查数十年，发现和积累了大量资料和数据，通过考古学、农学、民族学、生态学等领域的深入研究，提出了完全不同于传统观点的亚洲栽培稻起源于阿萨姆和云南的崭新学说。参与此书的翻译，一方面让我大开眼界，学到了不少知识，另一方面承蒙程侃声先生赏识，竟得以受教于其门下。程先生兼通文理，识达古今，学品高尚，是引领我进入学术之门和给予我跨学科研究视野的恩师。程先生鼓励我做人类学，于是又引荐我认识了江应樑、汪宁生等前辈人类学家。汪宁生先生治古代史、民族学和考古学，是国内民族考古学的前驱者。先生为人耿直，广博严谨，学问独树一帜。数年间常往府上求教，受益良多。为了打好基础，使今后能够很好地从事人类学研究，我于1983年考入云南省社会科学院任实习研究员，继而攻读杜玉亭、王树五先生的硕士研究生。那时的学习环境令人怀念。研究生部主任袁任远先生为培养学生不遗余力，费尽心血。所聘授课教师皆为一流学者。我们从经济学家朱应庚先生、民族史学家木芹先生、现代史学家谢本书先生、考古学家张增祺先生、民族理论专家熊锡元先生及诸多国内外民族学、人类学家学到的知识和治学态度，终生受用。现在许多老师已步入晚年，但仍然耕耘不止。如张增祺先生，十余年前由城市移居乡里，在抚仙湖畔筑庐而居，闭门谢客，著书立说，比较时下浮躁、喧嚣的专家学者，实不可同日而语。导师杜玉亭先生有多个研究领域，而基诺族研究则是其安身立命之本。杜先生现已七十余岁高龄，但每年仍坚持到基诺山调查数月，半个世纪不间断地研究一个民族，这样的人类学家在国内可以说绝无仅有。杜先生对学生要求近乎苛刻，然而竭力鼓励学术创新。当时我提出希望从生态人类学的角度研究刀耕火种，一些学者因不知其学术意义而不以为然，更多的学者则认为过于“敏感”应予以回避，而杜先生则毫不犹豫地给予了肯定和支持。为了做好这个课题，他让我求教于时任中国科学院热带植物所所长的裴盛基研究员。裴先生为国际知名学者，是我国民族植物学研究的开创者。从做学生到现在，我与裴先生及其

诸多同事、学生保持着密切的关系，从他们那里学到了很多生态学、植物学的知识以及民族植物学、民族生态学的理论和方法。最近10年，与我合作最为密切、给我支持和影响最多的学者当推王国祥研究员。王先生从事民族文化研究始于1958年，50年来在傣族、布朗族和比较文学研究领域取得了诸多开创性的令国内外学者瞩目的成就。1997年他参与由我主持的“云南民族文化生态村建设”项目，作为项目负责人之一，他在理论和实践方面均卓有建树。他虽然年近70，并患有高血压病，然而仍坚持长期住村调查研究，其对事业的执著、热忱深深感动着项目组全体成员，是大家心目中的楷模和典范。最近先生又出版了大著《傣族文化求是录》，他在赠我的书上如是题词：“情谊半世纪，山高水又长。”充分体现了他的谦虚和对后学的关爱。

我从事人类学研究之后，先后在云南省社会科学院、云南民族博物馆和云南大学工作。也许是巧合或是“命中注定”，我到以上几个机构时皆为筹建机构，所以从事的都是草创性的工作。1987年云南省社科院成立社会学研究所，我是负责人，该所的成立填补了云南社会学科科研机构缺失的空白。1989年，云南省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石有才、杨丽天调我到该委参与筹建云南民族博物馆，在马立三主任、王正芳副主任的领导下，先后担任筹备组副组长和副馆长，一干10年。1999年，时任云南大学副校长的林超民教授诚邀我到云大人类学系主持工作，该系前身为“人类学与社会工作系”，为林超民和王筑生两位教授于1996年恢复兴办，1999年人类学与社会工作分家，我即于此时调入云大担任人类学系主任。此后数年间，云大民族学先后获得民族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民族学博士后流动站和民族学国家级重点学科，可谓兴盛一时。这自然是学校领导和相关部门的重视和大力推动，然而人类学系全体教师在教学和科研上作出了出色的业绩确是不争的事实。2002年，经林超民教授多方斡旋获得伍马瑶女士捐资建成了“云南大学伍马瑶人类学博物馆”主体建筑，时任云南大学党委书记的高发元教授热忱动员我出任馆长领导建设博

物馆，这又是一项需从文物征集开始的白手起家的富于挑战的事业。不难看出，如果说我在不同的岗位上做了几件有意义的开创性的工作的话，那么，还得感谢上述各位领导的信任和我创造的良好机遇和条件，同时还得感谢同事们的支持和帮助。

访者：我们都知道您和日本的许多著名研究机构保持着密切的学术关系，请您简单谈谈和他们的合作。另外，欧美的学术界恐怕也有很多您的朋友？

尹：我与日本学术界发生关系，始于刀耕火种的研究，而选择刀耕火种研究，则与我此前曾从事日本学者提倡的“照叶树林文化论”的研究有关。所谓“照叶树林文化论”，是20世纪70~80年代在日本学界兴起的一个探索日本文化源流的学说。此学说的创始人著名学者中尾佐助、上山春平、佐佐木高明等。他们根据多个学科的研究认为，在东亚从喜马拉雅山南麓的阿萨姆地区经云贵高原、长江中下游地区至日本中南部这一照叶树林（亦称长绿阔叶林）地带，在古代曾经是一个具有众多相同文化要素的文化区，由于这些文化要素最为集中的地区是阿萨姆和云南，因此阿萨姆和云南应是此文化区的中心。古代日本文化的形成有南北文化传入的途径，而照叶树林文化亦是形成日本文化的一个重要源流。照叶树林文化是一个多层次、多要素的复合文化，刀耕火种农耕文化即为其基层文化之一。原日本国立民族学博物馆馆长佐佐木高明先生是照叶树林文化论的倡导者，又是研究刀耕火种的大家，仅此领域，他就有《热带的刀耕火种》《东南亚的刀耕火种》《日本的刀耕火种》等著作。1984年初夏，佐佐木高明一行访问云南，拜见时他得知我研究云南的刀耕火种，便鼓励说要抓紧田野调查，待调查资料装满几个箱子之时，邀请我去日本交流。1990年，佐佐木高明先生果然委托该馆的周达生教授邀请我去日本访问。半年时间，佐佐木先生和周先生送我许多著作，多次安排时间与我讨论给予指导，并破例提出要我做论文博士。由于我对博士学位不甚重视，所以一直没有认真对待，辜负了先生的厚爱和期望，至今



仍心存内疚！1990 年我作为学者第一次出国访问，得以进入日本“民博”那样的学术圣殿，获取了许多资料和信息，而我此后能与众多日本学者和机构交流，也与此次日本之行有很大关系。

日本“民博”，是我与日本学界交往的第一个中心。位于大阪的国立民族学博物馆是世界一流的博物馆和日本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中心。其时该馆有 5 个研究部，约八十位学者。多年来，除了梅棹忠

日本“民博”是我与日本学界交往的第一个中心。位于大阪的国立民族学博物馆是世界一流的博物馆和日本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中心。其时该馆有 5 个研究部，约八十位学者。多年来，除了梅棹忠

日本“民博”是我与日本学界交往的第一个中心。位于大阪的国立民族学博物馆是世界一流的博物馆和日本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中心。其时该馆有 5 个研究部，约八十位学者。多年来，除了梅棹忠

国立民族学博物馆是世界一流的博物馆和日本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中心。其时该馆有 5 个研究部，约八十位学者。多年来，除了梅棹忠

国立民族学博物馆是世界一流的博物馆和日本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中心。其时该馆有 5 个研究部，约八十位学者。多年来，除了梅棹忠

约八十位学者。多年来，除了梅棹忠

约八十位学者。多年来，除了梅棹忠

一、田中耕司、松林公藏等教授一直保持着密切的合作关系。中心为国际东南亚研究的重镇，其杰出的学术团队及其优良的学风，对我影响至深。在中心度过的紧张和愉快的生活，使我终生难忘！

东京地区，是我与日本学界交往的第三个中心。与该区相知最早的学者是东海大学的渡部武教授。渡部武专攻中国文化史，治学极为严谨、精细、执著，在中日学界享有较高的声誉。东京外国语大学的唐立（Daniels）教授与渡部武先生一样，亦是我的学术挚友。他早先治中国科技史，是李约瑟中国科技史研究班子成员，后转而研究东南亚的掸人和云南的傣族。1995年，我受聘到唐立供职的东外大亚非语言文化研究所任客座教授，在那里又认识了川田顺造等著名人类学家。20世纪90年代前期，渡部武和唐立曾两次组织研究团队与我当时所在的云南民族博物馆合作进行云南农耕文化调查研究，拙著《云南物质文化：农耕卷》的资料在一定程度上即得源于此项合作的

家。20世纪90年代前期，渡部武和唐立曾两次组织研究团队与我合作



议的文化生态体系》在美国翻译出版。后来美国福特基金会决定资助翻译出版拙著《人与森林——生态人类学视野中的刀耕火种》，遂请他担任翻译，他为此花费了大量精力和时间。当代中国人类学著作因文字障碍国外知之不多，拙著得以在国际学界流传，实赖福特基金会和马思中之力。其次说王富文（Nicholas Charles）教授。我与王1990年认识于日本国立民族学博物馆，其时他供职于香港中文大学，后回英国剑桥大学，数年前又转到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王富文研究苗族，曾多次到云南作田野调查，在我担任系主任期间，经他斡旋，我系与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太平洋研究院人类学系建立了交流关系。该院教授汉·维杰瓦达纳（Gehan Wijeyewardene）博士赠送我方图书1818册，该院接受了我的两个学生赴澳攻读博士学位，我亦接受了对方两名博士生到云南从事研究。2004年冬天，我应邀到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访问，进一步促进了双边交流关系。再说法国原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馆长德木累尔（Henry de laumley）教授。该教授为国际著名的古人类学家和博物馆专家。1998年冬季他邀我访法，安排我考察了巴黎和法国南部数十个博物馆，后来又接受了我的学生赴法学习。最近8年，我和我的同事们在云南创建了一批“民族文化生态村”（亦称生态博物馆），并建立了云南大学人类学博物馆，这些事业的成功，无疑得益于对日本和法国等众多博物馆和文化保护事业的考察和学习。

说到对我的科研事业的影响，还不能不说美国福特基金会。1990年，为建设云南民族博物馆，该基金会曾资助我赴日本考察了近百个不同类型、不同专业的博物馆；此后又资助翻译出版了拙著 *People and Forest—Yunnan Swidden Agriculture in Human - Ecological Perspective*。最近8年，我们所从事的“云南民族文化生态村建设”项目亦是福特基金会资助的。该会资助的可贵之处，不仅仅在于经费，还在于可使从事项目者的观念和能力得以提升。与该会项目官员合作，无论是项目设计还是实施过程，我感到都是一种学习，受益之大，非一